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爱国主义教育丛书

火烧圆明园



一、“万园之园”圆明园

圆明园是中国古典园林艺术发展的巅峰，也是世界上无与伦比的园林建筑的瑰宝。

历史上的圆明园，是清王朝统治时期，集中全国财力物力，役使无数能工巧匠，耗时 150 年，在平地上完全靠人工营造出来的一座规模宏伟、景色秀丽的皇家园林。其中，最早兴建的部分叫圆明园，相继扩建的部分称长春园和绮春园（后改名万春园），三园紧相毗连，浑然一体，总称“圆明三园”。圆明三园占地 5200 多亩，外围总长近 20 华里，园内散布着 140 多所富丽堂皇的宫殿楼阁和 100 多处秀丽如画的人造景观，加上众多大小不同、形状各异的湖泊池沼点缀其间，使它成为中国古典园林艺术的精品总汇，在世界园林建筑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在清代，它的盛名传到欧洲，曾被誉为“万园之园”。

令人痛惜的是，这样一座举世无比的园林杰作、中外罕见的艺术珍品，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却遭到帝国主义侵略者极其野蛮的摧残。1860 年英法联军攻陷北京，对圆明园大肆劫掠后，又放火焚烧，致使这座世界名园化作了一片废墟。

圆明园座落在北京西郊海淀镇北的平原上。据北京大学教授候仁之先生考证，“海淀”原为一片浅湖的名称，故址在今海淀镇西北的低地上，元代时有人给它起了个具有文采的新名字，叫“丹禾麦泔”。这里地势低下，间有潜水溢出地表，又是原来玉泉山与瓮山（万寿山的前身）诸泉的中下游，为营造人工园林提供了充沛的水源。加上西山峰峦近在眼前，青山绿水，景色极佳。在元代以前，海淀附近的劳动人民通过围堤造田，种稻植荷，已经把这里开辟成了风景优美、禽鸟汇集的自然风景区。

到了明代中叶，海淀的自然风光传播开来，到这里观光游玩的人与日俱增，有的人甚至在湖边开辟园林，兴建别墅，长期定居下来。其中最著名的，一个是武清侯李伟，一个是书画家米万钟。李伟利用海淀湖水的一部分，营建了清华园；米万钟则在清华园引水的下游，增辟了勺园。“勺园”的命名，就是取“海淀一勺”的意思。清华园开阔壮丽，勺园深邃幽雅，两者均以清澈的流水和茂密的花木取胜。当时有人写诗赞颂说：“丹禾麦泔边万泉出，贵家往往分清流。李园米园最森爽，其余琐琐营林邱。”

清朝统治者定都北京后，看中了海淀湖区的秀丽景色，于是在明代遗留下来的故园基础上，大兴土木，营造离宫。康熙皇帝首先利用清华园旧址改建成畅春园，作为西郊离宫。接着又于 1709 年在畅春园以北华家屯（今挂甲屯）附近为其第四子胤禛（即清世宗雍正皇帝）修建赐园，并亲笔题名为“圆明园”。其用意，据雍正皇帝在《圆明园记》中说：“圆明意志深远，殊未易窥，尝稽古籍之言，体认圆明之德。夫圆而入神，君子之时中也；明而普照，达人之睿智也。”雍正皇帝继位后，继续扩建圆明园，并在园内设署办公。1725 年，雍正皇帝首次留住圆明园。此后，每年新正郊礼后，皇帝就移居园内生活，直到冬至大祀前夕，才回到城内的皇宫里；除了夏天去热河行宫以外，一年之中，皇帝的园居时间达 2/3 以上，并且形成惯例。雍正以后的五位皇帝，只有乾隆皇帝死于皇宫，其他人或者死在圆明园，或者死在热河行宫。因为园居成了一种宫廷时尚，每位皇帝对营造园林都格外重视，其

中最为尽力的要数乾隆皇帝。乾隆皇帝曾经六下江南，游遍了长江以南的名园胜景，每次出巡他都让画师仿画江南各地的名胜风景，回京后在圆明园内动工仿建。例如，1763年，仿照海宁陈氏隅园，在圆明园内建安澜园；1767年，仿照江宁的瞻园，在长春园内建如园；1775年，仿照鄞县范氏天一阁，在圆明园内建文源阁，收藏《四库全书》。此外，像杭州西湖的三潭印月、雷峰夕照、平湖秋月、苏堤春晓、曲院风荷等10景以及苏州的狮子林等名胜，都在圆明园中被仿建出来。乾隆皇帝在位60年间，圆明园的改建扩建始终没有停止过，以园中最大的湖泊——福海为中心，向北拓展了圆明园的面积，向东增修了长春园，向南合并了王公私园，建成绮春园。到1770年，圆明三园的兴建工程基本完成。三园的排列仿佛是一个倒过来的“品”字形。

圆明三园都是水景园。园林的设计者充分利用地下丰沛的水源，进行了大胆的创造，在平坦的土地上，开凿出许多大小不同、形状各异的湖泊和池沼，堆筑起无数连绵起伏、曲折迂回的丘陵和岗阜。在峰回路转之间，到处萦绕着清澈的溪流，潺潺的流水。这些回环流转的溪流把大大小小的湖泊池沼串联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庞大水系，它将整个园林分割成数以百计的‘自然’空间，同时也为游园者提供了舟行游览和水上供应的便利。垒石而成的假山、聚土而成的岗阜和散布园中的河湖，共同编织成一幅烟雨迷蒙的江南水乡的秀丽景观。诗人王 运在《圆明园词》中说：“谁道江南风景佳，移天缩地在君怀。”指的就是这种小中见大、平地造园的博大气势和宏伟规模。

圆明园是三园之中面积最大的一个。它的前部是朝房，入大宫门过金水桥，进“出入贤良门”，迎面便是“正大光明殿”。这是皇帝朝会听政的地方，殿前有宽阔的广场，东西两侧有文武官员的朝房，建筑形式与城内的皇宫相近似。正大光明殿的北面，即殿后有“前湖”。往北再隔一重殿，有九个小岛环抱住“后湖”，其中最大的岛上建有“九洲清晏殿”。后湖的东北面，有仿杭州西湖的著名景观“曲院风荷”。由此向东，就是园中最大的湖泊——“福海”。福海海岸由十岛环成，海中有三个小岛，名为“蓬岛瑶台”。据说它是按照宋代大画家赵伯驹所作《仙山楼阁图》的画意建造的，整个形状内方外圆，很像古时的方孔铜钱。圆明园的西北角建有“安佑宫”，建筑形式模仿北京城内的太庙（今为劳动人民文化宫），殿内供奉着清代皇室祖先的灵位。殿前有两对华表，巍峨屹立，极为庄严。

长春园位于圆明园的东边。由圆明园的福海继续东行，过明春门就是长春园。它用圆明园中“长春仙馆”中“长春”两字命名，始建于1749年，到1751年基本完工，占地1000余亩。这是一座中西合璧的园苑。其中，既有模仿中国江南名胜建造的秀丽景观，如园中著名的“狮子林”16景，就是将苏州狮子林描画下来后仿造的，它的假山全由青石堆成，今天还能看到青石山的遗迹；也有模仿西洋建筑的西洋楼区。西洋楼区是1747年至1760年间，由意大利画家郎世宁、法国传教士蒋友仁、王致诚等设计监造的。它位于长春园本部以北，自成一区，用地南北狭窄，作东西延伸，自西向东依次排列着谐奇趣、万花阵、养雀笼、方外观、海晏堂、大水法、观水法、远瀛观、线法山、方河、线法墙等建筑和园景，构成与其它景区风格迥异的一个部分。长春园中著名的建筑物还有澹怀堂、淳化轩、泽兰堂、思永斋、玉玲珑馆、宝相寺、法慧寺等，特别是建于湖中的“海岳开襟”，是帝后们从明春门进来后看到的第一景，因而建造得格外富丽豪华，远远看去就像海市蜃楼一般。

绮春园位于福海的东南，与圆明园只有一墙之隔，原来叫“春和园”，

1769年才改名为“绮春园”。嘉庆年间，将园西诸小园并入，奠定了绮春园的最后规模。绮春园的面积比长春园略小，又由于它是由若干小园合并而来，因此全国没有一个统一整体布局。小园之间，有围墙相隔，各自独立。绮春园的大宫门位于园的东部，从宫门区至敷春堂形成一条南北轴线。园的中央部分，建有展诗应律、春泽斋、生冬室、四宜书屋等园林建筑群，是全园重点。园的西南部及东北部均以水面风景为主，各自拥有较大的湖面和岛屿，构成了绮春园的独特景观。全园共有湖面17片，大小不同，但彼此沟通，连为一体。湖中建有岛屿，增加了水景的内容和层次，绮春园是清皇族的住所。道光初年，因畅春园日见颓败，改变了将太后太妃们奉养在畅春园的旧例，而让她们到绮春园居住。1860年绮春园被英法联军焚毁。1873年同治皇帝在重修此园时，拟将它作为慈禧太后的住所，更名为“万春园”。但因国库拮据，重修工程半途而废。

圆明园是中国人民血汗和智慧的结晶，它集古代园林建筑之大成，是一颗闪耀着智慧光芒的东方明珠。法国人格罗西曾经这样描述他亲眼看到的圆明园盛况：“这个巨大的宫苑，园地的全部，布置着人工所造的小山和丘陵。有高到两丈，甚至于五六丈的。这些小山的分布，都是按照计划来经营的。”“在每一个山谷里，都有依其特有的计划而构造的宫殿。建筑的正面是用圆柱和窗牖，并涂上金色再加上彩色的髹漆，墙垣是用灰砖建成，再雕镂上花纹，屋顶覆以彩色的琉璃瓦，红、黄、蓝、紫掺杂配合，变化万千，形成极其美观而悦目的境界。仅仅为了装饰的亭阁，它的宽大程度就足够帝王和他的随从做为住所之用，真是令人不敢置信。仅仅一个宫殿就需要消费库金400余万法郎，而其他家具等物并不计算在内。在这样一个巨大的宫苑圆明园中，大约有200多座宫殿，并附有护卫和太监的住所，这些宫殿之间的距离，大约相隔数米，都有墙垣或林木掩盖着。”“宫殿有的建在岩石的高处，可以临高下望，景色奇绝，变化万千。可以看到用作点缀的桥梁和空谷兰花，绿荫里闪现着金碧辉煌的高大宫殿，庭院中陈列着繁花异卉，小山上的泉水瀑布徐徐的流下，这样美妙无比的景致，真迷人心目，令人有置身仙界之感！”

修造这样一座宏伟壮丽的皇家园林，耗费了中国人民难以数计的巨大力和财力。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大规模修建扩建圆明园共计花费了多少白银，历史上没有作过统计。按照嘉庆四年（1799年）统计，1793年至1798年5年内维修圆明园共开支白银149万两；另据道光四年（1824年）统计，1818年至1823年5年内维修圆明园共开支白银108万两。照此估算，仅维修费一项，圆明园在150年间就耗费了3000—4500万两白银。而其造价，至少是维修费的10倍以上。同时，由于圆明园是御园，是皇帝办公和休息的地方，每个宫殿里都摆设了极其贵重的珠宝器物，它的总价值更是我们无法估算的。

二、英法联军犯北京

圆明园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被英法联军焚毁的。要想了解圆明园遭难的历史，还得从第二次鸦片战争说起。

第二次鸦片战争是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继续。通过1840年至1842年的鸦片战争，英国侵略者在中国攫取了巨大的利益。比如：中国将香港割让给英国，赔偿英国鸦片烟款及军费2100万元，向英国开放广州、福建、厦门、宁

波、上海五处为通商口岸，通商口岸的关税由中英双方协定，英国在中国享有领事裁判权和片面最惠国待遇等。英国在鸦片战争中的帮凶美国和法国，随后也以武力胁迫签订不平等条约的方式，在中国取得了和英国相似的侵略权益。

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后，英国资产阶级欣喜若狂，认为东方最庞大的工业品市场已经被打开了，从而掀起了向中国倾销商品的热潮。例如，1843年英国向中国输出商品总值为175.6万英镑，1845年达到239.4万英镑。但是，好景不长，1846年以后逐年下降，最终停滞在150万英镑左右。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一是英国资产阶级对中国市场需求不了解，他们运来的大批钢琴、刀叉和西洋玩具，在中国根本无人问津；二是中国当时仍然是小农经济占绝对优势的国家。男耕女织，自给自足，对洋布洋货需求不大；三是鸦片走私贸易消耗了中国很大部分财力，1850年输入中国的鸦片达53000箱，售价约在3000万元以上，鸦片走私阻碍了合法的工业品贸易。英国资产阶级政府从鸦片走私贸易中获得了巨额利润，它不想靠取缔非法的鸦片走私来扩大合法的工业品贸易，相反试图通过攫取更多的侵略权益，扩大对华商品输出，同时使鸦片贸易合法化。

为了共同的侵略利益，英、美、法三国采取了联合行动。1854年10月，英国公使包令、美国公使麦莲乘坐兵船北上大沽口，要求面见皇帝，提出修改条约的要求。法国公使布尔布隆因兵船正在修理中，他本人没能北上，只派使馆秘书与英美公使同行，但携带了由他签署的要求修改条约的公文。三国公使提出的主要要求是：开放中国全境，特别是长江沿岸和沿海地区；实行鸦片贸易合法化；进出口货物经过内地关口不能再行征税；各国公使进驻北京。一句话，就是要求整个中国向西方侵略者全面开放。咸丰皇帝看到这些要求后，认为“所要各条，均属荒谬已极”予以严辞拒绝。1856年7月，美国新任驻华公使伯驾由香港北上抵达上海，再次向清政府提出修改条约的要求，具体内容与两年前提出的要求大体相同，英法代表自上次修改条约交涉失败后，对这种非强制性的外交讹诈手段已不抱大的希望，因而只是向两广总督叶名琛发出一些照会，表示对美国外交讹诈的支持，但没有与美国公使联袂北上。结果，伯驾的外交讹诈一无所获，只得灰溜溜地返回香港。

英法两国看到空言恫吓难以达到预期目的，决心使用武力迫使清朝政府屈服。正好在这时，发生了“马神甫事件”和“亚罗号事件”。所谓“马神甫事件”，只不过是法国侵略者顺手捡起的一个侵略口实。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法国派遣了大批传教士来华传教，并进行间谍活动。本来，按照条约的规定，外国传教士只能在五个通商口岸传教，不准深入内地活动。但是，这些传教士凭借着领事裁判权的庇护，无视条约规定，擅自潜入内地，进行各种违法活动。其中有个名叫马赖的法国神甫，从广州出发，一直窜到广西西林县。他在那里贿赂当地县官，收买流氓林八、马子民等为教徒，为非作歹，激起民愤。1856年2月，西林县新任知县张鸣凤应民众要求，将马赖与林八、马子民逮捕，并处以死刑。消息传到巴黎，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硬说马赖是“无辜的受害者”，派人向清政府提出“惩办凶手”等要求，清政府官员推说不知此事，没敢据理反驳，拿破仑三世便以“保护圣教”为名，积极策动对华战争。所谓“亚罗号事件”，更是英国侵略者无端捏造的一个侵略口实。1856年10月8日，广东水师千总梁国定带领官兵在黄浦港内逮捕了海盗李明太、梁建富和另外10名涉嫌船员。李明太等人当时正在中国走私

船“亚罗”号上。该船船主方亚明曾将此船在香港登记注册，事发时注册已过期失效，但他聘用英国籍爱尔兰人托马斯·肯尼迪为船长，事发后肯尼迪将此事报告给英国驻广州领事巴夏礼。巴夏礼借口人员被执、国旗受辱，致函两广总督叶名琛，要求清政府释放人犯并向英国赔礼道歉。叶名琛根据事实，在复照中驳斥了这种说法，指出：“亚罗”号不是英国船，而是中国船；一只中国海盗船，为了掩护自己的非法行径，有时也挂起它无权悬挂的英国旗；但在此次事件发生时，“亚罗”号上根本没有悬旗，既然没有悬挂英国旗，又从何产生英旗受辱的事？为此，叶名琛留下两名海盗和另一个名叫吴亚认的证人，将其余9人送还。但巴夏礼蓄意扩大事态，拒不接受。他还威胁说：如果48小时内不送还全部12名水手，并书面道歉及保证今后不再发生同类事件，英国海军将对中国船只采取行动。叶名琛拒绝了他的无理要求，但为了息事宁人，最后派人送还了捕获的全部12名人犯。可是，巴夏礼又节外生枝，挑剔中国派去的官员职位太低，并且没有正式道歉文书，拒绝接受和平解决。10月23日，英国海军少将迈克尔·西马摩各厘率领3艘军舰由香港向广州进犯，突入内河。29日，攻进广州城内。但因兵力不足，又遭到中国军民反击，英军很快退到城外。消息传到伦敦，英国首相巴麦尊提议对中国正式开战，这个提议在议会里引起了激烈争论。议员得比明确指出：“亚罗号船是中国人建筑、中国人出售、中国人购买的，船员是中国人，船归中国人所有。”议员林德赫斯特愤怒地说：“英国驻华公使包令，自己承认船籍登记证是无效的，那只划艇没有权利悬挂英国国旗。可是，请注意他说的话：‘船不在我们的保护之下，不过中国人并不知道这一点。看在上帝的面上，千万不要把这一点透露给他们。’以往有过比这更恶劣、更可耻的行径吗？还有过比这位在英国政府担任要职的人，所提出的口实更虚伪的吗？”尽管英国议会通过对内阁的不信任案，但是巴麦尊通过解散议会，强行在新的议会里通过了他的提案。

1857年4月20日，英国女王任命原加拿大总督额尔金为高级专员和全权大使，统一指挥原在香港的海军和由英国本土、毛里求斯、新加坡、印度等地调往香港的陆军对中国作战。5月9日，法国皇帝任命葛罗为特命全权专员，率领法国陆海军前往中国，参加侵华战争。7月和10月，额尔金与葛罗先后抵达香港。但是，由于印度爆发民族起义，额尔金统率的英军调往印度镇压起义，侵华战争被推迟了。12月12日，英法两国专使下令封锁广州河道，并向两广总督叶名琛发出最后通牒。当时，在广东的英法联军只有5679人，其中法军950人，英军4729人。叶名琛认为英法代表“故作恐吓之势”，既没有认真应付，也不积极部署防务。28日，英法联军炮轰广州城，第二次鸦片战争正式开始，30日，广州将军穆克德纳在城上竖起白旗，英法联军随即占领广州城。1858年1月5日，叶名琛被英法联军捕获，后来死在印度加尔各答。广州沦陷后，被英法联军侵占了4年之久。

为了迫使清政府早日就范，英法联军在占领广州后，立即趋兵北上。美国、俄国也与他们暗地勾结，相机配合。1858年4月13日，英法舰队抵达大沽口外。这些兵舰中，有英国船10余艘，法国船6艘，美国也有3艘船赶到。24日，英、法、美、俄四国公使联名投递照会，要求清政府派全权代表在天津或北京就修改条约问题与他们举行会谈。在谈判进行过程中，5月20日，英法军舰突然炮轰大沽炮台，大沽守军进行了英勇还击，英法侵略军有100多人被打死打伤。然而终因寡不敌众，大沽炮台弃守，英法舰队直扑天

津。5月30日，英、法、美、俄四国公使到达天津近郊。清政府急忙派大学士桂良、吏部尚书花沙纳作为钦差大臣赶赴天津，与四国代表进行谈判。在英法两国代表的威逼和美俄两国代表的利诱下，清政府的代表全面接受了四国代表的要求，与他们分别签订了严重损害中国主权的《天津条约》。7月，英法联军南下广州。

《天津条约》订立后，桂良、花沙纳随即前往上海，与英、法、美三国代表进行修改税则的谈判。异想天开的咸丰皇帝，想以免除外国商品的全部关税为条件，换取废除已经订立的《天津条约》，后见废除条约没有可能，又责令谈判代表至少要除去他们认为利害关系最大的4项内容。即：外国公使进驻北京，长江沿岸通商，外国人可以在内地任意游历，赔缴军费后英法才退还广州城。桂良等人认为，免税固然是“外夷”愿意接受的，但全免关税必然导致国库空虚，而且“外夷”在欣然接受免税后仍然会按照条约索取他们所要的一切，因此没有向英法美代表提出咸丰皇帝的荒谬建议，也不敢提出废除前述四项内容。经过多轮谈判，清政府代表与三国代表分别签订《通商章程善后条约：海关税则》，承认鸦片贸易是合法贸易，准许大量进口。

第一次大沽口炮战的失败，也使清政府认识到，天津海口防务松弛，存在着极大的弱点。1858年7月，英法联军刚刚撤离天津海口，咸丰皇帝就命令带兵王大臣僧格林沁会同新任署理直隶总督瑞麟，前往天津布置防务。他们在距天津30华里的双港安营扎寨，建筑炮台，共设置9营兵力，建筑炮台13座。接着，又修建大沽海口炮台，在原基址上建立炮台7座，增建炮台1座。大沽守军则由原来单一的陆军1600人，扩大为包括水师2000人、步兵800人、马队200人的混合部队。距大沽30华里的北塘，也重修了旧炮台，建立了新炮台，并安设炮位，除原守军300名外，又增拨了500名。同时，对于天津至山海关一线的炮台土垒，责成地方官员重建。

英法侵略者获悉清政府有反悔之意，并在大沽口加强防务以后，决定重新诉诸武力。按照《天津条约》的规定，双方使节应于次年在北京交换经过本国政府批准的条约文本。咸丰皇帝不愿意让外国使节率兵进京，因而命令桂良、花沙纳在上海等候，以便在那里就近换约。1859年6月，英国新任驻华公使普鲁斯、法国新任驻华公使布尔布隆、美国新任驻华公使华若翰抵达上海。随同他们前来是一支庞大的舰队，其中有英舰19艘，法舰2艘，美舰3艘，船上载有海陆军官兵2000余人。他们拒绝在上海会见清政府代表，径直率军北上。6月中旬，抵达大沽口外海面，这时清政府决定接待这些公使，但指定他们不带武装由大沽口稍北的北塘口登陆，并且预先告诫他们说：“现在大沽海口，已节节设备，如轻易入口，恐致误伤。”但是，英法美代表毫不理会中国方面的正当要求。6月25日，英法军舰强行驶入大沽口，开炮轰击炮台，并派陆战队强行登陆。炮台守军英勇还击，以猛烈而准确的炮火压制住了侵略者的凶焰。激战一昼夜，英法联军军舰被打沉4艘，打伤6艘，登陆的1100名侵略军中，英军被毙伤492人，法军被毙伤14人，英美军队还各有1名士兵被活捉，英国海军上将何伯也受了重伤。如果没有在场的3艘美国军舰援助，英法侵略者几乎无法撤出大沽口。中国军队在这次激战中，有38人阵亡，其中包括直隶提督史荣椿，但大沽炮台和海防设施没有受到大的破坏。

英法联军在大沽口战败的消息传到其国内后，两国资产阶级疯狂地叫嚣要扩大侵华战争。他们叫嚷着要对中国实行“大规模的报复”，要对中国海

岸线全面进攻，打进京城，将皇帝逐出皇宫。1860年2月，英法两国重新任命额尔金、葛罗为侵华专使，并分别以格兰特和孟托班为侵华军司令。5月下旬，英法战舰和运输舰205艘（英舰173艘、法舰32艘）及军队25000余人（英军18000人、海军7000人），陆续到达上海。7月初，英法联军取海道北上。清政府负责海防的钦差大臣僧格林沁，只集中兵力防守大沽海口，对于北塘海口的防守重视不够，认为北塘是盐滩，英法联军登陆困难，因而没有设防。8月1日，英法舰队开进北塘。随后，抄袭大沽炮台的后路。21日，发动对大沽炮台的进攻。驻守北岸炮台的直隶提督乐善带领士兵拼死抵抗，激战至晚，全部以身殉国。驻守南岸炮台的僧格林沁当晚便将守军全数撤走，第二天撤至天津，而后又撤至杨村，最后竟撤至离通州（今北京通县）仅10华里的张家湾。接手南岸炮台防务的直隶总督恒福23日放弃炮台，24日天津沦陷。

天津沦陷的当天，清政府任命桂良、恒福为钦差大臣，赶赴天津议和。31日，桂良抵达天津，会同恒福等人与英法代表谈判。额尔金、葛罗提出了远比《天津条约》更为苛刻的条件，桂良等人不敢完全同意，坚持要英法两国首先退兵。英法两国代表不予理睬。9月9日，英法联军自天津出发北犯，13日抵河西务，接着又向通州前进。清政府慌忙改派怡亲王载垣、兵部尚书穆荫为钦差大臣，由通州前往天津议和，但英法联军已出天津，谈判只得改在通州举行。英法两国分别派巴夏礼、威妥玛、巴士达、美理登为代表，到通州进行交涉。由于英法代表坚持苛刻的条件，这次和谈没能取得任何进展。咸丰皇帝荒谬地认为，英国派往通州的谈判代表巴夏礼是联军的“谋主”，把他扣留下来就是一个大的胜利。在谈判破裂的9月18日，载垣通知僧格林沁将巴夏礼等26名英国人、13名法国人在张家湾拘捕，押送到北京。同一天，英法联军猛攻张家湾。中国守军英勇抵抗，力战不胜，僧格林沁带兵退守通州城西八里桥。9月21日，英法联军进攻八里桥。中国士兵奋不顾身，齐心杀敌，给侵略者以沉重打击，但却没能守住这道最后的防线。

英法联军占领八里桥，为进攻北京城打开了通路，咸丰皇帝在震惊之余，以办理和局不善为名撤销载垣、穆荫的钦差大臣头衔，改以同父异母弟恭亲王奕訢为钦差大臣，留在北京主持议和。皇帝自己则在9月22日清晨匆匆带领后妃宫女和一批王公大臣离开圆明园，经密云北上，逃往承德的避暑山庄。于是，古都北京成了不设防城市。

10月6日，英法联军到达海淀和圆明园一带。圆明园的劫难由此开始了……

三、文化宝库遭洗劫

英法联军将圆明园作为进攻北京的首选目标，是因为他们知道圆明园是世界著名的文化宝库，收藏着数不尽的奇珍异宝，而且此前咸丰皇帝一直留在圆明园内，占领圆明园既可以抢掠到世间罕见的宫廷珍宝，又可以抓住皇帝，迫使中国政府投降。

1860年10月6日，法国军队首先侵入圆明园。根据法国人高第尔（H·Gordier）的记载，法军占领圆明园的过程是：“是日，孟多邦将军，遵英军格兰特将军之约，进兵圆明园。（法军）绕英军之后而进，成一弧形。7时抵园，军曹长比挪（M·de Pine）先入，与守军交接，声闻于外，孟多

邦将军乃入据园中第一院。英将格兰特失道，屯在城北。第二天孟多邦将军才派人告知。英使额尔金爵士和英帅格兰特，在10月7日上午11时到圆明园。”此处所说的孟多邦，即法国侵华军司令孟托班。

在占领入口处之后，法军在圆明园大门口设置了岗哨，并在树荫下露营。根据英军翻译官斯温霍的记载，7日清晨他陪同英军旅长先期访问圆明园时，那里的情况是：“法国将军为英国骑兵保留了一段地带，他预计他们在巡游搜索撤退的满州军之后会回到他那里来的。他们的营地四面为墙垣和房屋所包围。士兵显露出很疲倦而且士气低落的样子，因为夜间曾两次闹惊慌恐怖，在这两次中法军已经等于无法控制了，完全不听他们军官的命令。”“孟托班领导我们进入这座园庭，始终一本正经地声明说他曾严禁他的部队进入墙垣以内，决定在英军未到达以前不进行抢劫，以便大家机会均等。我们从中路进到一个宽大的石砖铺地的庭院，这儿躺着两具清朝官员的尸体。法国人向我们保证说，他们是两个满洲兵，前晚曾抗拒法军进入，并曾击伤两个法国军官。两个所谓的满洲兵结果变成是太监。他们穿着平常的官服，头上戴着红缨帽。”“使我们感到惊诧的是，法国军官对他们喜爱的东西开始动手攫取。金表和小件的珍贵物品被这些先生们以骇人的速度攫取，很快地消失在他们很大容量的口袋中去。”

抢劫珍宝的事情，在法军入园时就开始了。英国人瑞尼(D.F.Rennie)的记载说：“法军走到避暑行宫的第一天，一切事物都平稳无事。军士们仅仅拿走了一些小物品作为纪念品，第二天的情形就大不相同了。——他们不再能抵抗物品的诱惑，军官和士兵们，都成群结伙，冲上前去抢劫——毫无纪律。”英国侵华专使额尔金7日上午抵达圆明园时看到的，正是这种情况。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下午5时，我刚从圆明园回来。它确是一项精致的文物，像一个英国公园一样——数不尽具有漂亮的房间的建筑，它们充满了中国的古董珍品以及漂亮的时钟、铜器，等等。但是，哎呀！这样令人悲叹的景象。法国将军提出了种种的抗议。他曾经制止掠夺以便捕获品能在两军中摊分，等等。在我所看到的房间中，一半东西不是被拿走便是捣得粉碎。我竭力设法将我们的一个团派遣来保卫这个地方，然后把东西进行拍卖。但是，在这样情况下，要凭组织能力来做事情是困难的，被留下的一些军官就曾装了两三车准备进行出售的珍贵物品……对一个地方这样地抢劫和蹂躏是够坏的了，而更加糟糕的是无谓的糟蹋和损坏。在那些价值1000万镑的财产中，我敢说5万镑都变卖不到。法国士兵正以各式各样的方法在毁坏极美好的绸缎，捣毁玉石装饰品和瓷器等等。”护送格兰特和额尔金去圆明园的英国军官沃尔斯利被拦阻在门口，他看到的是另外一种景象：“就在这个时候，法国军官不断地在出出进进，进去的空着两手，出来的满载着抢劫到的各式各样东西，许多人穿着华美刺绣的妇女的袍褂，差不多所有人都戴着漂亮的中国红缨帽来代替法国的军帽。在格兰特爵士和额尔金勋爵刚进去后，我待在外边的那个时刻，驻扎在大宫门外的一个团部军营在敲着法国‘集合鼓’。但是毫无用处：很少几个人，不到十个人走出来；其余的毫无疑问是在圆明园内进行抢劫。”7日清晨陪同英军旅长先期访问圆明园的英军翻译官斯温霍说，当他从圆明园中出来时，法国军营已经耽溺在丝绸和宝石中。“每一个人都拿出几样罕见的珍宝给我看，问我它们价值多少。因为我是一个翻译，同时还带着一个太监，所以他们把我看成是一个了不起的行家。一个法国军官搞到一串上等的珍珠，每一颗等于小孩玩的弹子那么大（这件东西他后来

很愚蠢地在香港以 3000 英镑的价格卖掉)。有的搞到镶满钻石的像铅笔盒那样的东西,有的搞到镶珍珠的表件和花瓶。去列举所有从圆明园中所盗劫出来的珍宝将是一件无边无际的工作,可是法国将军还声明说,没有拿过什么东西,因为严禁掠夺。”

看到法军已经动手抢劫,英军立即行动起来。7 日下午,便加入了抢劫的行列。本来,法国侵华军司令孟托班和英国侵华军司令格兰特见面时约定,双方各派出 3 名代表组成专门委员会,负责挑选最珍贵的物品,以便在两军之间均分,同时把最有价值的东西挑选出来,送给法国皇帝和英国女王。但是,格兰特等不及了。当天下午,他下令允许用那些随他而来的军官们任意选取他们所喜爱的物品作为“纪念品”。英国随军牧师莫·格赫在自述中说:“每人都似乎不愿放弃这个特权,纵情肆意,予取予携,手忙脚乱,纷纭万状。这人也许可喜景泰蓝的宫瓶,那人或者贪恋一件绣花的长袍,也许又有人念及将来的时候,就挑选一件皮大衣。”晚上,格兰特又发出了一道“仁慈的”命令,允许每个军团的一半军官在第二天上午到圆明园抢劫,但这批人必须在中午赶回来,以便其余的一半军官在下午去抢劫。英国陆军军官赫利思在自供中说:“第二天早晨,我很早就起身,但那天全军的军官也同我一样比平时起的早。当我在营前上马时,军营中的牧师率领着由各级军官组成的队伍正从我面前走过,向圆明园行宫出发。”“纵马急驰过乡村和田野,我比上述的军官队早到高塔处一小时,并且立刻找到了靠近圆明园南门的法国军营。在那里遇见的第一件事,便是一支荷枪的法国兵正护送着一辆骡车由门内走出,车上装满了我们称为马蹄金的金锭,因为这种金锭铸造的形状很像马蹄。”“门口有一位法国卫兵向我致敬。横穿过庭院便是觐见大殿,殿内除一些极大的景泰蓝花瓶而外,其余的东西全被抢走了。我转到右边一个小房间,里面满是黄色封面的小册子,我想这些册子定是园内藏品的目录。”“在园中,我又继续乱窜过一连串的房屋,这些屋内的东西,已全部被抢走,但我仍能拾得一些细小的东西,我找到一颗方形而尚残留着印色的皇帝任命各省巡抚和高级官吏的玉玺,玺上更附有雕刻成狮形的把子。”“我更找到一个奇形镂金的花盆,在金缕之间,更用白色的珊瑚琢成文字。盆中充满泥土,在泥土中载着一株高约一寸的黄金树。树枝上悬挂着红玉为核蓝宝石果子。此外,我又收集到很多卷上等质料的绸缎。我把掠得的全部物品装在 7 个筐子里,这 7 个筐子是从门口的卫兵处要到的,而守卫圆明园的法国军官又供给我所需要的中国苦力(俘虏)。于是我跳上拴在门边铁环上的坐骑,命 7 个中国人抬着我的掠夺品在前面走,我骑马执枪在后面押着回到北京的军营。”这个疯狂的掠夺者,回到英国后成了有名的大富翁。

7 日至 8 日,圆明园遭到英法联军肆无忌惮的洗劫。英军翻译官斯温霍写道:“法国军营仍扎在园前,法国哨兵仍站在大门口,可是不需要出入证——这个地方任凭人随意蹂躏践踏。出现的一种恐怖的毁坏场面!不久前,这些整齐地摆设着古玩珍品的房屋中所呈现的那种寂静气氛,被完全搅乱。军官和士兵,英国人和法国人,以一种不体面的举止横冲直闯,每一个人都渴望抢到点值钱的东西,多数法国人都拿着巨大的棍棒为武器,遇到不能挪动的东西,就捣个粉碎,在一间屋子里,你可以看到好几个各级等级的军官和士兵钻在一个箱柜里,头碰头,手撞手,在搜寻和强夺里面的物品。另一间屋里,大群人正争先恐后地仔细检查一堆华美的龙袍。有的人在对着大镜子玩弄掷钱的游戏。另外的则对着枝形吊灯搞掷棒打靶来取乐。尊重身份的

事情已经完全看不到，占优势的是彻头彻尾的混乱状态。”“由于抢劫者的不断扩大搜查，一些新的房屋经常被发现，里面还没有被触动过，摆满了古铜制品、钟表珐琅瓶瓮以及数不尽的玉石古玩。这些都是抢劫者所要蜂拥夺取的。捕获品实在太多，而搬运工具却很缺乏。抢劫进行相当时间之后，轻巧便于携带的珍贵物品越来越难找了。当地老百姓就被抓来作为搬运大件古董的搬运工。”法军翻译官德里松写道：“这一大群各种肤色、各种式样的人，这一大帮地球上各式人种的代表，他们全都闹哄哄地蜂拥而上，扑向这一堆无价之宝。他们用各种语言呼喊，争先恐后，相互扭打，跌跌撞撞，摔倒又爬起，赌咒着，辱骂着，叫喊着，各自都带走了自己的战利品。初看起来，真像是一个被人踏翻了的蚂蚁窝，那些受惊了的好干活的黑色小动物都带着谷粒、蛹虫、蛋，或口含着麦秆向四面八方跑去。有一些士兵一头套着皇后的红漆箱，另一些士兵半身都缠着织锦、丝绸；还有一些士兵把红宝石，蓝宝石，珍珠和一块一块的水晶石都放在自己的口袋时，衬衫里，帽子里，甚至胸口上还挂着用大珍珠做的项圈。再有一群人，他们手里都拿着各式各样的时钟、挂钟，匆匆忙忙地走开。工兵们带来了他们的大斧，把家具统统砸碎，然后再取下镶在上面的宝石。更糟糕的是有一个人竟把路易十五式挂钟也打碎了，为的是取下它的钟面，因为他错把标出时刻的数字都看做是钻石做的，而事实上却只是水晶做的。不时，有人叫道：着火了。于是有不少人都匆忙跑去，把许多东西全扔在地上；他们扑灭了在高墙上蔓延的火焰，又把许多丝绸、缎子和皮货都堆在地上。这一幅情景只有吞食大麻酚的人才能胡思乱想得出来。”“当我返回营部时，夜幕已降，人们都满载战利品而归，所带的东西各式各样，简直不可思议，从银做的锅子直到天文镜和六分仪，这都是些大块金属，他们是肯定无法带走的。”晚上，“我们这里开起了化妆跳舞会；炮手们来的时候身上裹满了皇后的旗袍，胸前尽是大官们的项圈。而在（英国人）那边。每个帐篷里都物品成堆，大家已经开始公开拍卖自己（掠夺来）的东西了。”

由于法军驻扎在圆明园外，官兵可以随时入园掠夺，以至于军队开拔时，竟然出现了浩浩荡荡的满载赃物的庞大车队。法军翻译官德里松惊叹说：“单是这支车队也得十足走上一小时！”法军炮兵抢到的东西最多，因为他们有马匹，有弹药箱，还有车辆。他们充分利用了弹药箱的每一个角落，而当弹药箱全都塞满的时候，他们又把放炮后用来冲洗炮管的水桶也塞得满满的，最后他们甚至把直到炮口的整个炮身也都塞满了东西。法国侵华军司令孟托班为了让自己的炮兵就此停手，不得不在穿得像中国官员或皇室公主的士兵中间走来走去，对他们说：“我的孩子们，把这些东西都放下来吧！你们反正也是不能把它们都带走的。假如我们遇上了敌人，又要打一仗的话，那么你们又拿这些东西怎么办呢？要相信我，我们现在马上就要到北京去；在那里有足够的东西给大家分的，大家要啥就有啥！”法军到底掠夺走了哪些东西，历史上没有记载，但从法军献给其皇帝拿破仑三世的礼物中可见一斑。这些礼物包括：（1）两根镶宝石的金手杖，长约40公分左右。它们的形状像是拉长了的C字，是用金子做成的，中间和两端均镶有很大的玉石，非常漂亮，做工极为精细。（2）一套完整的中国皇帝的龙袍。这套龙袍由好几件依次叠起的衣服组成：第一件是绣有金边的绸衣；第二件是精钢打制的锁子甲；第三件最贵重，是金饰的黄色绸衣，上面有光彩夺目的各色刺绣，再加上用金子和宝石所做的纽扣。附在这套龙袍上的，还有一顶用金子和钢

做成的战盔，盔上有钢制的尖状物。（3）一座涂金描釉的铜宝塔，以及各色釉制的大瓶和好几个用金子和釉做成的神像。这些东西是离皇宫不远的御花园中一座庙宇的组成部分。（4）两座很大的铜制涂金怪物像，每座约重 400 公斤。（5）两卷做工很好的非常长的窗帘。（6）最后还有许多戒指、项圈、酒杯、漆器、瓷器，以及数以千计的珍奇玩物。

法军翻译官德里松回忆说：“我得承认，有时候我确实感到很难过，譬如说，我曾看到从宫殿到我们的军营之间都堆满了绸缎和许许多多被踏坏了的、踩脏了的珍贵衣料，这些东西少说点也得值上两千万。还有，我也曾看到有些士兵竟用做珍贵手稿的羊皮纸来点自己的烟斗或烧饭。又如在我们离开的时候，大家竟把许多精制的时钟、挂钟和雕刻好的象牙都扔在车轮的轨道里，把它们填满，好让大炮和车辆的轮子在上面滚过去。再如，我还曾亲眼看到，有好几幢精巧、却又壮观的建筑物都被大火所席卷，在我们的眼前消失。这些事都令人十分痛心。”

和法军相比，英军到达圆明园迟了一天，兵营又设在离园门较远的地方，在抢劫过程中处于不利地位。英军军官全都加入了抢劫行列，并且抢到了大批的珍宝；但“好多军士以及差不多整个单位的士兵，由于值勤关系被剥夺了参与抢劫的机会。”为了平息士兵的不满，8 日晚上，英国侵华军司令格兰特宣布：收回军官们搞到的所有东西，将全部战利品集中拍卖，所得款项充作所有进军北京部队的公益金，士兵得 2/3，军官得 1/3。在这笔基金中，格兰特还添上了从法国军队那里分得的圆明园银库中的白银。英军掠夺来的一部分物品曾被安排在喇嘛庙的大殿中展出，其中有：各种色调的白的和绿的玉石，古色古香的嵌花的珐琅瓶瓮、青铜器物、金银的人像等等古玩，黑貂皮、小獭皮、紫貂皮、羊羔皮等各种名贵的皮货，杏黄色缎子制成、用金线锈着大小的龙、镶有银鼠皮或紫貂皮男子的皇帝的朝服，和许许多多各种颜色的绸缎和绉纱。这些只是脏物中的小部分，大量的珍珠、宝石、金银器物甚至皇帝玉玺都被军官们塞进腰包，或者献给长官了。例如，10 月 21 日有一名英国军人致函他的母亲说：“我曾经从皇帝的御用宫殿中搜集到一些美好的东西——我想为家里所有人都搞点象样的东西。我看到了一个了不得的战利品——皇帝的国玺。”英国女王得到了和法国皇帝价值相同的礼物；英国侵华司令格兰特，则从军官们手中拿走了一把雕满花纹的赤金酒壶。

10 月 9 日，英法联军撤出圆明园，移驻安定门外。同时，向清政府发出照会，宣布将于 13 日带兵入城，勒令守军交出安定门。13 日，留守北京的王公大臣义道、周祖培被迫交出安定门，北京城沦陷。

在围困北京城期间，自己认为从圆明园中掠夺得还不够多的英国军队，10 月 11 日组成包括 1200 名骑兵的远征队，带着成千辆的车子和军队中所有驮兽回到圆明园再次进行洗劫。直到 13 日早晨，他们才带着满载脏物的庞大车队和兽群回到兵营。在这次远征中，他们深入到布满豪华住宅和可与皇宫相媲美的宫殿腹地，掠夺到了先前没有被发现的大批珍宝。英国陆军军官赫利思自供说：“我们更奉命掠夺我们所能掠夺到的一切，并携带车辆载回我们所喜欢的东西。因为我不附属于任何连队，所以非常自由，而我对于圆明园的地理又很熟，于是便想在园内由南到北游历一番。”他先到了皇帝的起居间，那里的桌子上陈列着各色各样雕刻精致的漆盒，屋里更有一些做工精美的山水浮雕，从中挑选了两种；接着，跳墙进入一条狭长的死巷，巷子的右边全是墙壁，左边的墙上则开有三个门；走进第一个门，房内沿墙放着三

个六尺高的大橱，橱内摆有各种玉器，不过除一些大件器皿和一些太大的无法带走的刻制品外，已经没有什么东西留下了，但他仍然拿了一件类似铺石的东西；进入第二个门，房内绕壁三面安放着三个大立橱，存放的都是珐琅制器皿，但也只剩下一些笨重而无法带走的東西，他们拿走了一个张着大嘴的怪像；走进第三个门，他看到有四五个印度塞克人，正在忙着从两个破碎的小塔上凿碎片，便顺手提起两个小塔中较大的一个，从塔的重量上他立刻判断出塔是金子铸成的，于是假称自己需要这些黄铜铸造的东西，将这两座金塔据为己有。“这座小塔约有7尺高，另外的一个约比这个短6寸。形状都像缅甸的尖塔，塔的第三层有梯级，再上有大钟，塔尖从钟上耸起。塔尖差不多是实心的，周围有圆形的藏文，很沉重。梯级也很结实，钟身约有一卢比厚。”

在这次掠劫活动中，赫利思的朋友华尔也抢到了一座金佛像。据说，佛殿里相同的佛像总共有500座，华尔不敢确信它是金子铸成的，所以只抢了一座。几天后，华尔把金佛像卖给了一个随军贩卖酒食的犹太人，得到676英镑。赫利思认为，金佛像可能值1000—1200英镑，对华尔贱价出售金佛像悔恨不已。

与再次洗劫圆明园同时，英军兵营里的脏物拍卖活动拉开了序幕，拍卖从11日开始，整整持续了3天。英国军官麦古在自述中说：“即使在大家都彼此认识的情况下，这一场拍卖仍提供那老一套的欢乐气氛。一切都高高兴兴地卖掉，虽然所有东西都标价很高，但它们仍达不到任何东西在欧洲的价值（格）。10镑、20镑或是30镑买一块翠玉，一个碗或是一个杯子是不算什么了不起的，珐琅瓷器同样吃香。一个豪侠的军官据说是受罗思柴尔德男爵委托全权代办的，你可以想象必然有一番竞争的情况了，毛皮衣服售价10镑至50镑。从库房里拿出来的成卷成捆的丝绸配搭出售，每份都配搭一点御用的黄色和一些不寻常的丝绸，由于有点白绉纱在里面，我曾花了20镑买了一份。知道自己花掉的钱并不是对自己毫无好处，这也是一种快慰，士兵们可以从其中得到三分之一，其余的被用来添补自己的捕获基金，这项款项为数虽然不大，而一个陆军校官差不多能分到50镑，其它等级以此类推。”在脏物拍卖狂潮中，强盗们用自己从圆明园里抢劫来的金银，购买同样是从圆明园里抢劫来的古董，然后再从脏物交易中分得好处，整个英军兵营沉浸在掠夺和占有后的狂欢气氛中。对于脏物拍卖获得的银元数字，英军官兵说法不一。翻译官斯温霍说，脏物拍卖获得32000块银元，搞到的金银估计约价值61000块银元，总计93000块银元。士兵瑞尼则说，抢劫来的物品售出款项总数为123000块银元，其中的1/3分给军官们，一个士兵所得的钱财，计17块银元。实际上，售出物品的价值远远超出它的价格。如前所述，圆明园中有许多贵重物品，联军士兵抢来后，或者塞进腰包，或者交给长官了，没有拿来拍卖；其余的物品，才由他们拿来进行欺骗性的交易。这些人是野蛮无知的掠夺者，对于东方珍宝并不识货，甚至连金质和铜质都分辨不出来，更不用说对物品的结构、造型、做工、美感进行鉴赏了。据翻译官斯温霍说，一卷丝绸的拍卖价格是1块银元（4先令6辨士），而它当时在欧洲的价格应该是3英镑至5英镑。随军商店和餐厅的老板们，趁机将供应部队的杂货和饮料用丝绸来作价，从而做成了一笔利润丰厚的大买卖。

肮脏的掠夺品交易不仅在英法军队内部进行，并在英法军队之间展开。法军翻译官德里松记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德里松有一个传令兵，来自北非，

名叫穆罕默德。经常对德里松说：“你是将军的朋友，他总是通过你的嘴来讲的，你就想法给我颁发一些奖章吧！”为了取悦德里松，他从圆明园归来时，双手满满地给德里松捧回来一大把珍珠。可是，德里松为了不使将军感到不快，同时也是为了得到十字勋章，一颗珍珠也没敢拿。正在这时，德里松的一位同事突然来访，对那个士兵说：“你要我拿什么来换你的珍珠呢？”士兵说：“你就给我一瓶烧酒吧！”“好的，那末一言为定。”这样，穆罕默德交出了他刚刚掠夺来的一大把珍珠。在圆明园营地中，军中酒商卖给军官的烧酒是每瓶 100 法郎；而在回到欧洲后，德里松同事得到的珍珠却卖了 35000 法郎。

英国军官赫利思在自供中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当我正站在屋内观察时，有两位法国兵走进来，其中一个兵手里挥舞着一件发光的東西，因之我问他有什么‘稀奇的古董’，他回答说：‘没什么别的，只有一只表。’在我要求他给我看看时，他把一个蓝色珐琅质的大表放在我手里，表的背面嵌有许多颗宝石，中央最大的一颗，直径约有半寸多，更在正面和背面的边缘上精巧地配置着许多珍珠。表的制造者是巴拿德公司。‘我希望买它。’我告诉那个法国兵。他问我给多少钱，但我不愿先出价，因为我知道如果由我定价，这买卖一定做不成，当他坚决不肯说出数目时，我只好建议由他的朋友——另一个法国兵来定价。他的朋友立刻说：‘15 块钱吧！’可是他不同意，并且抱怨他的朋友说，别人的表曾卖了 25 块钱。因此我对他说：‘我愿出 20 块钱。’他很满意我出的价格。我从黄色册子里扯下来一页空白纸，写下我的姓名、官阶、所属军团以及欠款 20 元的凭据交给那位法国兵，可是他直到一月之后才来取表价。这只表正如其他在这宫殿内的东西一样，上面附有两个中文小标签，后来我把这两个标签给翻译员卫妥玛看，他把签上的字读给我听，我才发觉我所买的这只表是在 1792 年英国使臣马戛尔尼送给中国皇帝的一件礼物。在我回英国后，又把这只表同表链送给原制造厂看，他们说，这只表的售价是 525 镑。”正是通过公开掠夺和欺骗交易，有一批英法联军的军官成了富翁。

这种英法军队之间的掠夺品交易不是偶然现象，实际上两座军营都变成了交易市场。英军翻译官斯温霍说：“至于小装饰品和小珠宝之类，接连好几天，法国军营出现了极大的诱惑力。你只要问一问他碰到的法国兵，他有什么东西可以出售的话，他会立刻拿出金的表件，一串一串的珍珠，玉石装饰品或皮货。好些有银元要花掉的英国军官们，立刻发现可以在法国军营里把它们转换成值钱的东西。差不多好几个星期，在英国军营和法国军营里，所谈论的尽是关于从圆明园里偷古玩珍宝，以及想要去把什么东西搞到手的事情。不少法国军官搜刮到相当的资财，而他们手下的士兵也腰中银元累累，这样就在军营中导致了許多违法乱纪和严重的闹乱子的事件。在他们从圆明园的野营回来后好多天内，他们的士兵被碰到时还是醉熏熏的，携带着抢劫得来的烈酒到邻近的村庄去。”

四、皇家园林成废墟

英法侵略军在疯狂洗劫圆明园过程中，为了掩盖抢劫罪行，并给清政府以“严厉的责罚”，先后两次在圆明园内及其附近的香山、玉泉山、万寿山等处大规模放火焚烧，将千古名园变成了一片废墟。

英法侵略军第一次大规模纵火，与抢劫圆明园同步进行，时间是10月6日至9日。清政府当时留驻北京的总管内务府大臣宝^均，在给逃往承德的咸丰皇帝的奏折中说：“八月初八日皇上銮舆起行后，总管内务府大臣文丰、明善遵旨照料圆明园。奴才（清朝内务府官员均为满人，他们给皇帝的奏折，自称“奴才”）当即进城，筹划拨解行在饷需，办理防守等事，讵意八月二十一日夷匪逼进（近）京城，九门戒严。奴才随同总统巡守大臣等昼夜在城防护。二十二日夜间，遥见西北火光烛天，奴才等不胜惊骇。惟当时夜深，恐其乘势攻城，不敢开门往探。至二十三日惊闻二十二日酉刻夷匪闯入圆明园。奴才等闻信之下，曷胜愤恨。旋于二十五日夷匪由园返回，当即往派司员前往探听。随据禀称：‘园内殿座焚毁数处，常嫔业经因惊溘逝。总管内务（府）大臣文丰投入福海殉难。’宝^均所说的咸丰十年八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五日，即公元1860年10月6日至9日。

10月6日，法国军队到达圆明园，立即入园抢劫，并放火焚烧。当时在京主持议和的恭亲王奕訢，在给咸丰皇帝的奏折中说：“该夷于二十二日，窜扰园庭，肆行焚掠……见庭宇间被毁坏，惟不能确指地名。陈设等物，掠劫一空，并王大臣园寓及宫门外东首朝房及海淀居民铺户，大半焚烧。”当天夜里，宝^均等人在城内看到西北方向火光烛天，就是法国侵略军在放火抢劫。

10月7日，英国军队到达圆明园，加入抢劫和纵火的队伍。这一天，不仅圆明园遭到大肆劫掠，侵略者还把魔爪伸向清漪园（万寿山）。宝^均在另一份奏折中说：“夷人二百余名，并土匪不计其数，闯入清漪园东宫门，将各殿陈设抢掠，大件多有损伤，小件尽行抢去，并本处印信一并遗失。”总管内务府大臣明善，在逐园清查后向咸丰皇帝报告说：“九州清晏各店、长春仙馆、上下天光、山高水长、同乐园、大东门均于八月二十三日焚毁。”

10月8日，英法联军的抢劫活动达到高潮，圆明园内多处起火，静明园（玉泉山）也遭劫掠。法军翻译官德里松写道：“在花园里，到处都有人群，他们奔向楼阁、奔向宫殿、奔向宝塔、奔向书室，唉！我的天呀！”“不时，有人叫道：着火了。”宝^均在给咸丰皇帝的奏折中说：“夷人陆续闯入静明园宫门，将各殿陈设抢掠，大件损伤，小件多经掠去。其静宜园（香山）夷人并未前往。”

10月9日，英法联军暂时撤离圆明园，在撤离前，再次放火焚园。英军翻译官斯温霍说：“当法国人对圆明园内部毁坏工作完竣后，他们烧焚了皇帝的寝宫，退出庭院，搬到安定门外的一个村子驻扎。”侵略者描绘焚烧圆明园的情况时说：“火熊熊的烧着，仿佛一张幔子……蜿蜒蜒到了北京，黑云压城，日光淹没，看起来仿佛像一个长期的日蚀。”圆明园的清道夫陆元春说：“及二十二日夜，英法兵即入园大掠……掠之所至，焚及随之，至为惨淡。自二十二至二十五，凡焚掠四日乃已。”

侵略军第二次大规模纵火，时间是10月18日至19日，纵火者为英国侵略军，除继续焚烧圆明园外，香山、玉泉山、万寿山等处的殿阁建筑也被劫掠焚烧，大火延烧了两天两夜。步军统领瑞常报告这次焚烧的情况时说：“窃自八月二十二日之后，该夷日日结队前往海淀一带驻扎。自九月初五日夷人

复以大队窜扰园庭，将圆明园、清漪园、静明园、静宜园内等各处焚烧。”带兵王大臣僧格林沁也奏报说：“查该夷因前获之巴夏里等三十余名，已死过半，是以初五、初六等日，复分股烧毁圆明园、三山等处，奴才望见烟气冲天，寸心如割，即马步官兵无不愤恨。”

英国侵略军纵火前，清政府的外交代表震骇于侵略者的暴行，已经作出了种种让步。当时，留京主持议和的恭亲王奕訢躲到了长辛店，留在城内与英法联军进行交涉的是他的代表、武备院卿恒祺。恒祺原任粤海关监督，与当时的英国驻广州领事巴夏礼交往甚密，有所谓“结盟之好”，曾参加《天津条约》的谈判。10月8日，恒祺擅自作主将前在通州拘捕的巴夏里等8名人质释放。10日，恒祺又主动陪同巴夏里到圆明园，寻访前被清军拘捕的英法官兵的物品和马匹。12日，恭亲王奕訢致函英国专使额尔金、法国专使葛罗，答应英法代表带卫队进城换约。13日，留守北京的王公大臣义道、周祖培被迫交出安定门，巴夏里率100余人进入北京城。14日，恒祺亲自持令箭打开德胜门，额尔金率英法联军三四百人入城，并在城楼上遍插旗帜，北京城被占领。

清政府的妥协退让不仅没能阻止侵略者继续施暴，相反因为有了被囚英法人员“死亡过半”这个借口，英国侵华专使额尔金竟然公开发布照会、贴出告示，要在光天化日之下彻底焚毁圆明园。10月14日，额尔金致函奕訢说：“圆明园者，英法侨民所受痛心疾首惨刑而死之地也。誓必夷为平地，

此条固无须恭王之承认，敝国统帅所已决定，亟待执行者也。”除此之外，额尔金还要求中国政府赔款30万两白银，补偿英国侨民伤亡损失，并在天津立碑纪念。法国侵华专使葛罗也致函奕訢，要求赔偿白银20万两，补偿法国侨民伤亡损失。葛罗反对焚毁圆明园，这倒不是因为他对这座万园之园存有什么善意，而是认为与其焚毁圆明园，还不如干脆抢劫并焚毁皇宫。10月16日，葛罗在给额尔金的信中说：“圆明园者，清帝行幸之离宫也；其地并未设防御，亦非敌战之区也；焚而毁之，实系无益之报复。余等所引以为伤心者，前此不幸惨酷之事，非能因此而补偿，故余等不宜存此想。余意以为北京城内之宫殿，乃全国政府之所寄，若先劫取其文物典籍，而后悉毁其宫殿，其在中国人与欧洲人之眼中，或将视此举为一种之报复与惩罚，其印象之深，比之仅焚毁一游幸行乐之离宫别馆（指圆明园）当远过之。诸帅如征询鄙见，予当以此说（焚毁城内宫殿）进，劝其速行。盖吾等今日，虽似决不至不逞吾志，然既奉政府之命而来，倘未逞吾志而去，则临行宁焚毁其朝廷宫殿也。”当天，额尔金复函葛罗，坚持焚烧圆明园。宣称：“惟毁坏圆明园一事，余决不能舍弃而不行也。赔款一层，英国侨民须有30万之抚恤费，交款期限22日上午，签约期限23日，且限于20日即答覆承认；否则下令焚毁北京各宫殿。”同时，额尔金还草拟了一份告示，译成中文后在英法联军驻扎的地方和圆明园附近建筑物及墙壁上四处张贴。它的大意是：“宇宙之中，任何人物，无论其贵如帝王，既犯虚伪欺诈之行为，即不能逃其所应受之责任与刑罚也。兹为责罚清帝不守前言及违反和约起见，决于18日焚烧圆明园，所有种种违约举动，人民既未参预其间，决不加以伤害，惟于清室政府，不能不一惩之也。”这份告示将英军的暴行说成是正义之举，宣称焚毁皇家园林不是对中国人民的伤害，想为他们破坏人类文明的野蛮行为找到根据，颠倒是非，莫过于此。

英国侵华军司令格兰特完全支持额尔金关于彻底焚毁圆明园的决定。他在一份公文中说：“余所以欲毁圆明园宫殿之故，今愿为左右一陈之。第一，被囚诸人，手足缚索，三日不进饮食，其受如斯野蛮之待遇，即在此地。第二，若对于中国政府所为不顾国际公法之残酷行为，不予以久远之印象，英国国民必为之不满。若现即与之媾和，订约撤兵而退，中国政府必以吾国人民为可以任意捕杀无忌，在此点上必须警醒其迷梦也。”“圆明园宫殿之为要地，人所共知。毁之所以予中国政府以打击，造成惨局者为此辈而非其国民，故此举可谓为严创中国政府，即就人道而言，亦不能厚非也。”内容相近的公文，格兰特发出了两份，一份给远在伦敦的英国陆军大臣，一份给法国侵华军司令孟托班。孟托班不同意额尔金的作法，于10月17日函告格兰特，不愿加入彻底焚毁圆明园的行动。信中说：一、予意此举，乃由于报复之心，为报复英法侨民所受之惨虐也。但并未逞吾人报复之志。二、再者，今若焚圆明园，将使恭王益增畏惧，不敢进行和议。如是，吾人依照前所宣言者，不得不进攻北京皇宫，终以颠覆清朝，此正违反吾两国政府所予之训令也。”由于法国军队不予合作，额尔金和格兰特共同商定，英军单独放火焚园。

英国将军们的胆大妄为，是得到他们国内的资产阶级政府支持的。早在1860年4月9日，英国陆军大臣西德尼·赫伯特就在给格兰特的指示信中，结合进入北京后的行动问题，转达了英国首相巴麦尊赋予将军们自由行动权力的明确指令。巴麦尊说：“我将赞成让军事统帅们（他们自然应该咨询外交官们有关这个问题的外交形势的意见）对进入北京有完全决策的自由。”指示信说：“巴麦尊勋爵认为占领北京会导致皇朝的覆灭，使一切混乱，毁坏我们的贸易的看法是无根据的。不过，很清楚，我们不能在那儿过冬，而且我们必须紧接在到达之后立刻离开。”4月17日，英国外交大臣罗素在给额尔金的指示信中，再次明确地赋予他以自由行动的权力。信中说：“我希望你了解的是，若时间地点情况显示不适当和不合时宜的话，勋爵阁下并不一定要对任何行动方针遵守不渝。”“在欧洲部队到达时放弃他的都城，会被遣责为承认那些中国朝廷由于愚昧一向鄙视的国家的优越性，皇帝的声望将受到很大的损失。”“在这种情况下，勋爵阁下和你开明的同僚葛罗男爵，必须使用女王陛下和她的盟国对你和法国大使所付托给你们的那种个人坚定和裁决的才能。”这两封指示信的核心意思是，在占领北京后将军们可以自由行动，为了达到英国政府的既定目标，不必顾虑清朝政府是否会垮台。

额尔金和格兰特在他们的资产阶级政府支持下，决心彻底焚毁圆明园。命令下达后，10月18日清晨，米启尔便率领第一师的步兵和骑兵团的大部分分开赴圆明园。几十支马队、三四千人一起闯进圆明园，从四面八方放起火来，顷刻间这座举世闻名的皇家园林就变成了一片火海。英军书记官斯文候写道：“不久，浓烟直冒，渐渐冲向天空，表明这件工作已经开始了。当白天慢慢过去，烟雾逐渐加大，并且越来越浓密，飘飘荡荡，仿佛一片大的云彩，罩盖北京；并且又像一个可怕的大风雨，将要来临。当我们走近行宫的时候，火声劈拍劈拍的响着，很是使人震惊，并且穿过一重重的烟雾，太阳照耀中天，使一切花草树下，都带了一种憔悴的病色。殷红的火焰，映在从事放火的军队们的面庞上，使他们看起来，仿佛恶魔一样，虽是毁坏他们不能恢复的东西，却洋洋自得的，觉得很是光荣。”“圆明园很迅速的变成一片蹂躏不堪的景象，但是墙垣之内，还有许多残余的物件。许多闲人四处

奔跑，东探西望，虽是穷僻的地方，都不饶过去，因为现在他们是被允许随心所欲的去抢劫了。在外面的一间小屋子里，找到从前马戛尔尼爵士呈献给道光（应为乾隆——引者）帝的两辆马车，完整如新。清帝似乎从来没有乘坐过，还是喜欢没有弹簧的本国骡车和轿子。又有两枝装好雷弹，零件配置完整的枪，也是马戛尔尼爵士所呈献的礼物，都在那地方找到了。在天文学和别种科学的器具里面，又找到了一枝英国制造的双筒枪，装在套子里面，还有些锡罐盛着火药和一箱一箱爱莱式的子弹帽子，旁遮普军第十五队发现许多的金子，分配起来，一个军官也能得着 9000 磅之多。”

彻底焚烧圆明园不是一天所能完成的，因此侵略军当天晚上留下来露营，准备第二天继续焚烧。由于大火还在熊熊地烧着，这天晚上，空气陡觉温暖。当一个个屋顶倾塌下来的时候，四面墙垣上的烈火，也渐渐闷塞下来，喷出大大的一卷一卷的黑烟。黑烟汇成的浓云，横空笼罩其上，有风自西北来，将烟团吹向城中。距圆明园 20 华里的北京城，天光黯淡，黑云笼罩了整个天空。

10 月 19 日，英军继续焚烧圆明园。同时，米启尔率领马队驰赴玉泉山、万寿山、香山，将万寿山的大报恩延寿寺、田字殿、五百罗汉堂及后山苏州河两岸商店式建筑抢劫一空，放火焚毁；将玉泉山 16 景、香山 28 景及园内著名的宗镜大昭庙和 81 间铜殿抢劫一空，放火焚毁。一个英国军人在给母亲的信中说：“为了我们可怜的伙伴的被谋害作报复，我们焚烧了皇帝在圆明园的宫殿，使之夷为平地。为了让你对这场大火的规模得个概念，我可以告诉你，在这两天的焚烧当中，被出动的（军队）达到 3500 人。”

对于英军 19 日的暴行，随军牧师莫·格赫在自述中作了比较完整的交待。他说：“有一两师军队布散在乡间，放火燃烧四个皇家花园中的一切宫殿，从圆明园开始，其次，转向西边的万寿山、静明园，最后轮到香山。”各部队接受了米启尔分派的任务，便冲向遍布山谷的鳞次栉比的宫殿和建筑物。“不久就看见重重烟雾，由树木中蜿蜒曲折，升腾上来。这些树木，掩荫着一座年代古旧的，靠近此园中心的广大的殿宇，屋顶镶着黄色的瓦，日光之下，光芒闪烁。鳞鳞屋瓦，构造奇异的形状，只有中国人的想象力才能构思出来的。顷刻工夫，几十处地方，都冒出一缕一缕的浓烟密雾来，仿佛英国狩猎射击的地方，隐藏在山边树林深处的猎人茅屋中升腾出来的炊烟似的。”“不久，这一缕一缕的烟，又集合为弥天乌黑的一大团，万万千千的火焰，往外爆发出来，烟青云黑，遮天蔽日。所有庙宇、宫殿、古代的建筑，轮奂辉煌，举国仰为神圣庄严之物和其中历代收藏、富有皇家风味、精美华丽、足资纪念的物品，都一齐付之一炬，化为灰烬了。”“当我们回来的时候，芬纳带着一两队骑兵，绕行一周，将我们进行时忽略过去的那些外面的建筑，也都一齐架火燃烧。我们回到圆明园之后，才知道第六十队的来福枪士兵和旁遮普士兵，已经将他们的任务，利用得极其巧妙，所焚烧的区域，宽阔而且遥远，现在所仅存的，就是上文已经描摹过的，自那座正大光明殿，以迄大门中间，所有建筑尚屹然存在，未付焚如。因为军队们驻扎其中，故迟迟有待。时已三钟，我们应须整队，开回北京，乃发布命令，一并焚毁。刹那之间，就找到了燃烧的材料，有几个手脚伶俐的来福枪队士兵，立刻动手放火，将这座正大光明殿，熊熊的燃烧起来。庄严华贵之区，且曾为高贵朝觐之殿，经此吞灭一切的火焰，都化为云烟了。层顶在火焰中已经燃了一些时候，不久就要倒塌，一百码外，就可以感觉到那种炎热扑通的响，震心

骇目，屋顶倒塌下来了。于是园门和那些小屋，也一个不留，一间不留，这所算做世界最宏伟美丽的宫殿的圆明园，绝不存留下一点痕迹。至是我们已经完毕这件大工作，便再回到北京去。”

经过两天两夜的焚掠，圆明园及三山等处的陈列品及珍宝文物绝大部分被劫走或破坏，主要宫殿及附属的亭台楼阁均被焚毁。关于圆明园的毁坏情况，总管内务府大臣明善清查后报告说：“至三园内正大光明殿等座，于九月初五、初六日焚烧。玉玲珑馆于十一日焚烧。”“其蓬岛瑶台、慎修思永、双鹤斋等座及庙宇亭座、宫门值房等处，虽房座尚存，而殿内陈设铺垫、几案床张均被抢掠。其宫门两边罩子门及大北门、西北门、藻园门、西南门、福园门、绮春园宫门、运料门、长春园宫门等处，虽未焚毁，而门扇多有不齐。查所有园内各座陈设木器及内库金银绸缎等项册籍，向系司房内殿等处管收，亦均被抢焚，无从清查。”“其大宫门、大东门及宫门外东西朝房、大部朝房、内果房、銮仪卫值房、内务府值班房、恩慕寺、恩佑寺、清溪书屋、阅武楼、木厂、征租房、澄怀园内近光楼六间、值房八间，上驷院、武备院值房等处，均被焚烧。档案房前后堂、汉档房等处被焚，满档房、样式房等处尚存数间，亦被抢劫，仅将印信护出无失。库房六座，被抢四座，焚烧两座。”关于珍宝文物被抢掠破坏的情况，英国《泰晤士报》记者于1860年11月7日发回的通讯说：“据估计，被劫掠和被破坏的财产，总值超过600万镑。”

圆明园的焚掠，在人类文化史上的损失是无法估计的。这次焚掠不仅毁灭了中国独一无二的名园，而且损失了中国历代积累和珍藏下来的历史文物（上自先秦时代的鼎彝礼器，下至唐、宋、元、明、清的名人书画）和不能用数字来估计的金珠宝物。如唐人描摹的晋时大画家顾恺之的《女史箴图》原藏圆明园，后被英军掠去，现藏伦敦大英博物馆。沈源、唐岱所画的《圆明园四十景图》被法军掠去，现藏巴黎法国国家图书馆。另外，圆明园内最大的藏书楼——文源阁被英军焚毁，珍藏在那里的总计36000册的《四库全书》和总计552函的《古今图书集成》一并化作了灰烬。

英法侵略军的焚掠暴行，遭到中国人民的切齿痛恨，也受到世界进步舆论的严厉谴责。法国大文豪雨果愤怒地写道：“有一天，两个强盗闯进了夏宫。一个进行洗劫，另一个放火焚烧。胜利原来可以成为强盗。胜利者把夏宫的全部财富盗窃一空，并把抢来的东西全都瓜分掉。”“我们教堂的所有财富加起来也无法和这一东方巨大的、且又漂亮的博物馆相比较。在那里不仅藏有艺术珍品，而且还有极为丰富的金银制品。真是战功赫赫，且又横财发了一票！一个胜利者把腰包塞满，另一个赶紧效法把箱子全都装着饱鼓鼓；两个人手挽着手，心满意足地回到了欧洲。这就是两个强盗的历史。”“在历史的审判台前，一个强盗将叫做法国，另一个则叫做英国。”

五、中国主权被践踏

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沙皇俄国加紧对中国东北的侵略扩张。1845年，俄美公司派人以贸易为名，潜入黑龙江江口以北地区。1846年，俄美公司奉沙皇和俄国外交部的命令，派船勘察黑龙江江口。1847年，沙皇任命穆拉维约夫为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上任后，立即研究制定入侵黑龙江的计划，并组建外贝加尔哥萨克军，储备军粮，准备入侵。1849年，俄国海军军

官涅维尔斯科依率领军舰深入库页岛和黑龙江江口地区，查清了黑龙江是一条由西伯利亚注入太平洋的河流，查清了库页岛不是一个半岛，而是一个海岛。1850年，涅维尔斯科依在黑龙江江口以北地区建立第一个军事据点彼得冬营，并在庙街建立尼古拉耶夫斯克哨所。1851年，他再次率领武装“勘察队”，入侵黑龙江江口以南和库页岛地区。1853年，沙皇俄国悍然授权俄美公司占领库页岛，并宣称外兴安岭以南、黑龙江以北及鞑靼海峡沿岸地区“属于俄国”。根据沙皇的命令，涅维尔斯科依在克默尔湾、阔吞屯、哈吉湾、库页岛分别建立哨所，将黑龙江下游的重要港口和军事要地，置于自己的军事控制下。1854年，沙皇俄国以“防范”英法占据俄属太平洋地区为名，派出近千人的军队武装航行黑龙江。1855年，沙皇俄国又以“剿办英夷”为名，派遣3000人的军队和481名移民武装航行黑龙江，并在黑龙江下游建立“移民点”。到年底时，非法占据黑龙江下游地区的俄国人达7000人，基本上实现了对该地区的军事控制。

腐败透顶的清政府，看不到沙俄向东扩张给中国边疆造成的危机，不仅不采取措施加强防备，相反为了镇压太平天国起义，还从东北大量调兵进关。黑龙江原有驻防军10000多人，被调入关内7000余人；吉林原有驻防军约10000人，也被调入关内7000人，地处要冲的吉林三姓、宁古塔等地，仅剩下兵丁800余人。吉林将军景淳为应付危局，奏请从关内撤回兵丁200人，竟然遭到咸丰皇帝的痛斥。上谕说：“此时粤匪（指太平天国起义军）未平，正在攻剿之际，调出官兵，万难遽行撤回……从来抚驭外夷，惟有设法羁縻，善为开导，断无轻率用兵之理。”

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爆发，为沙皇俄国趁机夺取中国北部领土制造了绝好的机会。1857年12月30日，英法联军攻陷广州。沙俄政府闻讯后，立即召回正在巴黎休假的穆拉维约夫，命令他与中国代表举行谈判，重新划定中俄东段边界。同时决定派遣海军少将普提雅廷作为专使，到北京“办理两国交涉一切事件”。为此，俄国政府装扮成是中国最好的朋友，向清朝当局表示：“贵国内地不靖，外寇侵袭广州……祈将两国边界之事及早完结，以后情愿与贵国彼此相安相保，共防将来不测之事”。话虽然说得好听，清朝政府明白沙俄这时派出专使的目的是趁火打劫，因而拒绝普提雅廷来中国。但是，清朝政府挡得住外交官，却挡不住侵略军。1858年4月，穆拉维约夫率领舰队到达黑龙江下游，蛮横地宣布：从这年的航期开始，凡留在黑龙江北岸的居民，均归俄国管辖。清朝当局指示驻守瑷珲的黑龙江将军奕山向穆拉维约夫“详细晓喻”，黑龙江以北的海兰泡等处均系中国地界，“勿使该夷肆意侵占。”然而此时的瑷珲，在军事形势上已经处于俄国擅自建立的海兰泡军事据点的炮口下，中俄会谈一开始就弥漫着不祥的气氛。曾在鸦片战争中丧师辱国的奕山，虽然依据《尼布楚条约》进行了抗争，但在俄军鸣枪开炮的威逼下，最终彻底屈服。5月28日，奕山与穆拉维约夫签订《中俄瑷珲条约》，规定将中俄东段边界由外兴安岭改为黑龙江，仅此一项就使中国丧失了6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还规定将乌苏里江以北40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改为“两国共管”。这份擅自割让大片领土的卖国条约传到北京后，没有得到清政府的批准，奕山被革职。

俄国专使普提雅廷不顾中国政府的反对，取道黑龙江，由海路直抵天津海口，向清朝当局提出所谓边界问题。遭到拒绝后，又南下上海、香港、与英、法、美国公使勾结起来。1858年4月，英法联军北上，进迫天津海口。

入伙上门抢劫的普提雅廷这时摇身一变，充当起英法与中国战争的调停人。5月20日，英法联军进攻并占据大沽，清朝当局恳求俄国从中转圜。普提雅廷乘机讹诈，表示若允俄国要求，可代向英法“说合”。清政府的谈判代表桂良、花沙纳，无知且又恐惧，竟于6月13日率先与普提雅廷签订了《中俄天津条约》。该条约共12款。俄国从此取得了沿海七处口岸通商、领事裁判权、片面最惠国待遇、军舰驻泊通商口岸等权益。

六、人民奋起逐顽敌

第二次鸦片战争给予中国的打击远比第一次鸦片战争更为惨重。由于清政府的软弱无能和指挥失误，只有25000多人的英法联军竟然由上海顺利地取道北上，轻易地攻占天津、侵入北京，不仅洗劫并焚毁了规模宏伟的皇家园林，而且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中国的领土主权、司法主权、关税主权、领海主权相继丧失，侵略者还把1600多万两白银的巨额赔款强加到中国人民的头上。面对侵略者的疯狂进攻，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中国人民不再犹豫，他们勇敢地拿起武器，给予入侵中国领土和领海的敌人以沉重的打击。

在广东沿海，侵略者的野蛮暴行激起了中国军民的强烈反抗。1856年10月英军进攻广州时，南海大沥96乡的万余民众立即行动起来，自备武器粮食，准备抗击英军。他们对霸占省河的侵略军船只，不断用放火筏、投炸药瓶、设水雷等方式进行袭击，迫使敌人层层设防。11月6日，中国沙船23艘冒着敌人的炮火进行了勇猛的反攻。就连英军统帅西马糜各厘也不得不佩服地说：“这些中国沙船，立即发起最勇猛的反攻，并斗志昂扬地坚持了至少35分钟。”27日，英国邮船“提斯特尔”号拖着载有从广州抢劫来的珍宝的划艇停泊虎门。深夜，忽有中国小艇百余只，“蚁集于前，开炮攻击”，掳获了英人满载脏物的划艇。12月24日，几万广州民众汇聚到十三洋行街上，愤怒地烧毁了外国商馆，迫使侵略者“尽栖船上”。30日，邮船“提斯特尔”号从广州开往香港，沿岸乡勇奋起狙击，打死英军11人，将邮船焚毁沉江。正是在中国军民的沉重打击下，迫使一度侵占广州的英国侵略军撤出了广州城。一年以后，1857年12月，英法联军再次进攻广州。遭到中国守军的顽强抵抗。广州沦陷后，城北三元里、石井、大朗等96乡的民众在佛山镇自发组成团练局，召集义兵数万人，准备反攻并收复广州。1858年3月，清政府派户部侍郎罗惇衍、前太常卿寺龙元禧前工科给事中苏廷魁主持团练事宜。他们以96乡团练为基础，在花县设立了团练总局。4月，团练局发动香港工人罢工，号召在香港、澳门等地为洋人雇用的华工“概行辞回家”，20000多名广东人踊跃响应，致使香港商务陷于瘫痪。6月，东莞县团勇在英军盘踞的将军署前贴出挑战书，诱敌到榕树头见仗。巴夏礼率英军前来，遭到团勇伏击，英军大败，巴夏礼坠马，险些被团勇伏获，《天津条约》签订的消息传来后，广东人民“其愤益深”，反抗更烈。据巴夏礼供认，整个6月和7月间，“对联军的轻微而厌人的攻击一直不断，终于在7月21日发展到一个武装夜袭的最高峰”。

在天津，战斗在海防前线的中国军民不断给侵略者以新的打击。1858年5月20日，英法联军进攻大沽炮台，遭到中国守军的有力回击。法国人德巴赞古写道：“炮台的设施都遭受了重大的破坏……然而中国人却还没有放弃

自己的阵地，继续奔向那些还没有被打坏的大炮。他们的炮手一个接一个地被我们灵活的射手所击中，然而却立即就有人替补。”经过激战，炮台弃守，30日，英法联军占据天津。天津沦陷后，侵略者在天津强占民房、抢夺财物、杀戮人民，无恶不作。6月12日，两名英国上尉带领几个士兵，“手执夷犬，登西北城上，指点民家”，激怒当地居民，“擒其夷卒，打跑夷犬”。19日，十几个法国士兵夜间结伙窜到锅店街，“抢去首饰衣服等物，并刀砍万成号瓷器铺门。”附近民众惊醒冲出，纷纷登上屋顶，用砖头打跑敌人，并缴获三杆洋枪。一年以后，1859年6月25日，英法军第二次进攻大沽炮台，中国守军用更加猛烈而又准确的炮火狠狠地教训了外国侵略者。香港出版的《中国邮报》报道说：“从一开始就很清楚，和我们交手的不是中国的中国炮兵。他们的炮火无论就其炮弹的重量来讲，或就其射击的准确来讲都达到了这样的水平，以至参加过中国战役的人，很少有人，我甚至可以断定没有一个人在以前曾经领教过。”当战斗激烈进行时，天津海口人民不顾危险，“欢欣鼓舞，馈送饼面食物”，给正在炮台上作战的守军以有力的支持和鼓舞。经过昼夜的激战，英法联军损失惨重，大败而逃。又过了一年多，1860年8月21日，英法联军绕道北塘，从后面向大沽炮台发动第三次进攻。炮台守军英勇还击，密集的炮火映红了清晨的天空。法国人布隆代尔写道：“敌人也不顾死活，全力进行自卫，用旧式长枪、长矛和弓箭拼命搏斗，把圆弹扔到进攻者的身近；有时把他们推到水壕里去，有时又通过炮眼把他们拖过来。”“在炮台内找到了包括司令官在内的成千具鞑靼人的尸体……我们有两百多个人失去战斗力，英国人在这方面的数字和我们相近。”尽管这次战斗最后以中国守军战败而告终；但是英雄们的报国壮举永垂不朽。

在北京，侵略者的猖狂进攻遭到了中国军民的顽强抵抗。1860年9月，英法联军逼近通州。18日，中国军队20000人在张家湾阻击敌军，与英法联军的先头部队4000人展开激战。21日，退守通州城西八里桥的中国军队30000人再次与得到增援的英法联军5000多人展开肉搏。这两次大战，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双方投入兵力最多，打得最为激烈的战斗。因为这是中国军队保卫首都的最后战斗，参战官兵以高昂斗志给侵略军迎头痛击。法国人德凯鲁勒写道：在八里桥“有一大群身着黄衣的中国人聚集在桥上和桥的四周。为首的乃是一位骑在马上长官，他勇敢地挺身而出，站在他的兵士的前面；他挥舞着黄旗，以示挑战。……这时，桥栏上的大理石被炸得粉碎，四散飞去，再加上炮弹的碎片，把桥板上安放着的石头老虎也给炸坏了，倒下去的人立刻由新的禁卫军所替补；而他们的长官则一手舞旗，一手执剑，始终站在前面。”这位英勇不屈的御林军将领，在所有士兵都牺牲后，仍然固守着他的阵地，忽然一颗罪恶的子弹打来，将他击倒在地，他手中的大旗也随之倒地。看到这里，法国侵华军司令孟托班不禁惊叹说：“啊！多么勇敢的人啊！我真希望别把他打死”。10月6日，法国侵略军闯进圆明园。在大宫门，守园清军与入侵者进行了殊死的搏斗，因为寡不敌众，圆明园技勇八品首领任亮率众退守出入贤良门，在那里，他们固守到生命的最后一息，决不再后退半步。英法联军进犯北京时，人民群众纷纷拿起武器，到处打击敌人，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故事。1860年10月，英国侵略军100多人进犯北京西郊的谢庄，谢庄民众在猎户冯三保的领导下，打退了敌人的两次进攻。英国侵略军不甘心失败，又派五六百人拖着大炮前来报复。冯三保的19岁女儿冯婉贞率领全村青少年猎手，针对敌人的枪炮能够攻远而不利于近战的特点，决定

进行近距离伏击。他们手持刀箭和盾牌，埋伏在离村四里的森林里，当敌人走进时，突然杀出，敌人还没来得及装填好火药就被杀得大败。青少年猎手越战越勇，全村民众热情支援，血战到傍晚，英军丢下大炮仓惶逃走，从此再也不敢进犯谢庄。谢庄人民取得了反侵略斗争的胜利。

在东北和西北边疆，侵略者的扩张活动遭到了中国军民的坚决抵制。1857年10月，俄军200人入侵黑龙江和松花江交汇处，并溯松花江上犯。中国军队迎头拦阻，赫哲居民闻讯赶来支援，迫使俄军沿原路撤回。1859年冬，沙俄侵略者窜到乌苏里江以东，强占中国领土。当地民众在刨夫（以采参为业的贫民）徐得林、张登瀛倡导下，在小绥芬河一带设立营座，开展斗争。到1860年春，发展到150余营，每营有数十人。他们向清政府主动请膺，愿为抗俄效力。与此同时，黑龙江和松花江中下游各处人民也相继组织起来，办法是在各屯各户居民中挑选年轻力壮的人参加民团，每十家选择一名户长，负责团练。当时仅黑龙江左岸地区参加民团的就有1377人，负责团练的户长有八九十人。黑龙江右岸地区的民团成员有1771人，负责团练的户长达154人。松花江沿岸的阿勒楚喀（阿城）、伯都纳（扶余）两城民众，也组建了民团。这些民团，四处设防，互通声息，遇有俄军，共同对敌，弥补了中国驻军的严重不足，对于遏制沙俄的扩张起到了重要作用。在西北，中国军民也同沙俄侵略者进行了英勇的斗争。1853年，沙俄侵略军侵占中国特穆尔图淖尔南岸、伊犁河下游一带，遭到当地人民的强烈反抗。沙俄侵略军强迫当地哈萨克居民给他们预备乌拉（杂役），勇敢的哈萨克族人民回答说：“我们并未归顺你国，无中国吩咐，不能预备。”1855年2月，沙俄驻塔城领事馆领事塔塔诺夫带兵侵入雅尔噶图金矿，杀害矿工6名。7月，俄国侵略者再度侵入矿区，杀害矿工及家属200余名。塔城人民在矿工徐天尧、安玉贤发动下组织起来，要求严惩沙俄凶手，遭到拒绝。8月26日，愤怒的回汉各族民众五六百人包围了塔城的俄国贸易圈，一举烧毁贸易圈内领事、商人房屋70余间，给侵略者以沉重打击。

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斗争，是保卫中华民族领土和主权的战争，它与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宣扬的“落后民族”的“冥顽不化”和“排外心理”毫无关系。在独立自主的基础上，中国人民不仅不反对与西方各国开展平等互惠的贸易和交流，而且还会抱着谦虚的态度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与技术，就像今天我们正在做的那样。然而，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不是这样看问题，他们试图通过野蛮的入侵和占领，甚至以火烧圆明园这样的暴行，要将中国强行纳入他们设计好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去，充当他们在东方的原料产地和商品销售市场，这样做理所当然地遭到了中国人民的坚决抵制。概括起来说，这也就是第二次鸦片战争所以暴发的基本原因。

